



北镇庙万寿寺碑文研究

王志钢

(辽宁轨道交通职业学院报编辑部, 沈阳 110023)

摘要: 论述了北镇寺庙的发展沿革,考证了唐代以来北镇的佛教寺庙碑志,重点校考了北镇庙万寿寺碑志。结合清代骈文复兴的历史背景,研究了万寿寺三则碑志的文学特点与美学宗尚。《万寿寺禅林比丘坛演毗尼碑记》骈散结合的写法、《北镇万寿寺香灯碑记》的骈体行文方式,均反映了当时的文学风气和艺术趋向。从地方志编纂角度,探讨石刻文献对于补清史及民国地方志的重要价值。此外,还从书法艺术角度分析了碑志的艺术价值。

关键词: 北镇庙;万寿寺;碑文

中图分类号: I0-05;K85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3851 (2019) 12-0661-09

On the inscription of Wanshou Temple in Beizhen Temples

WANG Zhigang

(Editorial Department, Liaoning Guidaojiaotong Polytechnic Institute, Shenyang 110023, China)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Beizhen Temples were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and the inscriptions of Buddhist temples in Beizhen area since the Tang Dynasty (618-907 A.D.) were examined. The inscriptions of Wanshou Temple in Beizhen Temples were mainly investigated. The literary and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hree inscriptions of Wanshou Temple were studied under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he Parallel Rejuvenation in the Qing Dynasty. The writing style of a parallel inscription of *Wanshou Temple Biqu Temple Zhuan Yan Pi Ni Inscription* and the parallel inscription of *Beizhen Wanshou Temple Xiang Deng Inscription* reflect the literary and artistic atmosphere at that tim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ocal chronicles compiling, the important value of stone inscriptions on complementing the history of Qing Dynasty and local chronicle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was explored. Besides, the artistic value of inscriptions on tablets was analyz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alligraphy art.

Key words: Beizhen Temples; Wanshou Temple; inscription

《周礼·职方》记载“东北曰幽州,其山镇曰医无闾”。北镇为“岳海镇渎”之一。北镇庙始建于隋开皇十四年(594年),各代均有封祀。现存北镇庙建筑是中国五大镇山(东镇沂山、西镇吴山、中镇霍山、南镇会稽山、北镇医巫闾山)神庙中保存最完整的。清代,为政治需要,北镇庙受帝王推崇程度之高超过了此前各代。乾隆等多名帝王亲自祭祀北镇庙,这在五镇中是所独有的。北镇庙的地位一度堪比五岳。

迄今为止,研究北镇佛教寺庙、道教宫观碑志的文献资料较少,如《近代辽宁地域社会视野下的寺庙文化研究》^[1]、《辽宁北镇医巫闾山寺庙碑文、古钱窖、古暗道的新发现》^[2]和《清代钱世黼北镇庙碑文考》^[3]¹⁷³⁻¹⁷⁶,另有个别文献探讨石碑保护性设计方案^[4]。文献^[1]没有论及北镇地区的北镇庙万寿寺,文献^[2]涉及的海云观是清代乾隆年间北镇地区建造的道教宫观。据《闾山海云观重修碑记》记载,海

收稿日期: 2018-10-16 网络出版日期: 2019-02-28

基金项目: 辽宁省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重点课题(2018lskztzd-019)

作者简介: 王志钢(1978-),男,辽宁沈阳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古籍整理与文化产业方面的研究。

云观所在的位置元代曾建有佛寺云岩寺^{[5]171-172}。文献^[3]虽有论及万寿寺碑,但主要考证碑志的作者及书法作者、研究文献的文学价值和艺术价值,未从佛教角度进行深入解读。

近年来,出现了研究清代东北地区佛教的文章。有的文章探讨了东北佛教的传播路线及特点,也探讨了辽西佛教^[6],但主要以朝阳为中心,研究东北佛教的早期传播,未能就清代东北地区的佛教传播等展开论述。有的文章论述了清代赤峰地区藏传佛教的情况,统计了现存藏传佛教庙宇,分析了僧团管理办法^[7]。也有研究者分析了东北金顶毗卢派这一禅宗宗派在清代的传播历史及宗教文化特点^[8]。总体而言,研究清代东北特别是辽宁地区佛教的文章不多见。

本文校勘了北镇庙万寿寺相关碑志,论述了寺院的创建时间、创建人以及康乾时期寺院的发展情况,并与盛京实胜寺相比较,探讨了万寿寺的地位与价值;从地方志编纂角度,探讨了石刻文献对于补清史及民国地方志的重要价值。本文还从文学史和书法史的角度探讨了碑志的艺术价值。

一、北镇的寺庙及佛教碑志

(一)辽代以前北镇地区的寺庙及碑志

北镇地区的佛教寺庙,辽代以前不可考。据《锦州府志·建置志》记载,清代广宁城东北有崇兴寺,相传为唐贞观时建^{[9]829}。清广宁知县张文治(康熙十四年至十八年在任)称辽志记载崇兴寺为唐贞观十八年(644年)时唐太宗令尉迟敬德监修,其论见于《艺文志》^{[9]873}。然《建置志》乃云“相传”。《辽史》《契丹国志》未载此事,辽代显州方志清季恐佚,不足征。《旧唐书》《新唐书》太宗本纪及尉迟敬德传均未言及此事,《全唐文》亦未载辽东崇兴寺碑文。未有唐代崇兴寺碑志传于今。辽去唐不远,《全辽文》中收录了部分辽代寺庙碑文,其中虽有明确指出某某佛寺系始建于唐者,但未载显州崇兴寺碑志。由于缺乏有力的文献证据或考古发现证明,因此不能成为定论。

(二)辽代北镇地区的寺庙及碑志

北镇是辽朝文化的发祥地,且辽代三帝均葬于显陵,辽世宗时期为奉护显陵设置显州(今北镇)^{[9]820},北镇为奉陵邑。辽代多名帝王尊崇佛教,如辽兴宗,出生于显州(今北镇),执政时期礼敬三宝,僧人而被拜三公、三师兼政事令的多达20多人^[10]。辽道宗信奉密宗,敕建了大量的密宗佛塔,佛塔之下依塔建寺,或塔建寺旁,如北镇崇兴寺塔

(今仅存辽塔)。在帝王扶持佛教发展的政策影响下,达官贵族竞相捐资建寺、布施礼佛。北镇地区佛教寺庙数量之多远迈前代,且式样精美,雕梁画栋,侈丽非凡。据石刻资料记载,“至于辽……最为事佛。辽江之西有山曰医巫闾,广袤数百里,凡峰开地衍、林茂泉清,无不建立精舍,以极工巧。”^{[11]49}然而,辽朝并无北镇地区寺庙碑保存下来。《全辽文》未载辽代显州寺庙碑志文。

(三)金、元、明三代北镇地区的寺庙及碑志

北镇地区金设广宁府(属北京路),元置广宁府路,明代隶属辽东都指挥使司。金、元时期北镇寺庙可考者较少。《全辽志·艺文志》收录的金朝蔡珪《医巫闾山》诗中有“萧寺门横入山路”句^{[12]676},惜未提及寺名。同书收录的金代李适《广宁十秀》诗中描写了广宁的佛刹^{[12]674}。《全辽志》编纂者认为,其中的望海、清安、玉泉、龙潭、青岩、崇泉六者均为佛寺。耶律楚材曾在显州书院读书,后仕元,官至中书令,《湛然居士文集》未刊载与旧邦金朝故邑广宁有关的寺庙碑志。《金文最》未收录金代北镇寺庙碑志。辽宁现存金代寺庙碑只有2通,一在朝阳,为兴中府尹银青改建三学寺及供给道粮千人邑碑铭并序^{[11]46-47,[13]},一在同为辽西地区、与北镇毗邻的义县^{[11]48},二者均不在北镇。

据《北镇县志》收录的《闾山海云观重修碑记》记载,元代寺庙有云岩寺,清代乾隆年间改为海云观,以道教宫观为主^{[5]171-172}。此则碑志实体不存,《辽宁碑志》未收录。《全辽志》“古迹”条记载了北镇崇兴寺等12座古寺,编纂者认为多为前朝遗制^{[12]636}。《湛然居士文集》和《全元文》未收录元代北镇寺庙碑文。辽宁现存元代寺庙碑17通,其中有10通保存在北镇庙内,但这10座碑均与祭镇有关^{[11]48-54,217-223},而与佛教无涉;其余7通碑中仅2通与寺庙有关^{[11]49-50,58-59},但地址均在义县。

《北镇县志·地理志》记载了北镇9座佛寺的10余通明代寺庙碑名称^{[5]48},如广宁城内东北隅崇兴寺存明正统时期、嘉靖时期碑各1通,编纂县志时字迹均尚可辨;广宁城内鼓楼(今存)附近的观音堂存万历时期古碑2通,嘉靖年碑1通,字迹均可辨识;广宁城内西北隅崇泉寺存嘉靖时期碑1通,字迹可辨,另1通漫漶莫辨;广宁城东南隅大佛寺存万历年碑1通,碑文完整无缺,字迹完全可辨。但民国县志仅收录了1篇道教宫观碑——闾山海云观重修碑记,未能收录金至明的北镇寺庙碑志文^{[5]165-184}。

明代《全辽志》《辽东志》、清代《锦州府志》《广宁

县志》以及民国《北镇县志》均纂有艺文志，但上述地方志的艺文志以及《雪履寻碑录》《满洲金石志》均未收录金、元、明三代北镇地区寺庙碑志。

明清两代，《辽宁碑志》收录的北镇地区佛寺道观碑志仅4通，其中，明代的1通为刻于明正统二年的重修玉泉寺碑文^{[11]224-225}。玉泉寺地址在闾山，不在北镇庙。

(四)清代北镇地区的寺庙及碑志

《辽宁碑志》收录的清代北镇地区佛寺碑志仅3通，均为北镇庙万寿寺碑志。《锦州府志》《北镇县志》也记载了清代北镇的部分寺庙名称及地理位置。《锦州府志》还收录了一篇寺庙碑志文^{[9]873-874}。北镇除此三通碑外再无寺庙碑实体保存下来。近年，当地还有道教宫观碑的发现^[14]，但尚无寺庙碑的新发现。

北镇庙万寿寺得名于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1]175}，是清代一所重要禅寺。据《万寿寺禅林比丘坛传演毗尼碑记》记载，乾隆十一年(1746年)万寿寺举行了戒律仪轨修习活动并确立了传戒制度^{[11]252-253}。据《北镇万寿寺香灯碑记》记载，乾隆十六年(1751年)万寿寺举行了捐资供奉香灯活动^{[11]254}，清政府中央六部官员中的刑部员外郎以及加太子太保衔(从一品)的政要等参与了活动。乾隆时期，万寿寺在盛京地区的影响力日益扩大。

历史上，多朝帝王曾遣官至北镇庙祭祀。清代乾隆年间在北镇庙墙东修建了广宁行宫，其与奉天行宫、夏园行宫为清帝东巡驻蹕的三大行宫。乾隆十九年(1755年)，清高宗第二次东巡，亲诣北镇庙，率王公官员祭拜镇神，登临闾山，创作了多首御制诗。清高宗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第三次东巡、四十八年(1783年)第四次东巡均驻蹕此行宫。乾隆年间，万寿寺禅林及重修北镇禅林记碑、万寿寺禅林比丘坛传演毗尼碑记碑(乾隆十一年立)、北镇万寿寺香灯碑记碑(乾隆十六年立)就矗立在广宁行宫南，且据《北镇万寿寺香灯碑记》记载，乾隆十六年，清代著名人物章佳·尹继善(其女嫁予乾隆帝第八子永璇为嫡福晋)参与了相关佛事活动，乾隆驻蹕广宁行宫时应予留意。此外，嘉庆二十三年(1819年)、道光九年(1829年)，清帝东巡均驻蹕于广宁行宫^[15]。

二、万寿寺禅林碑志校释

《重修北镇禅林记》《万寿寺禅林比丘坛传演毗尼碑记》《北镇万寿寺香灯碑记》是中国历史上仅存

的三篇北镇庙佛教碑志文献，是研究北镇佛教文化与历史的珍贵的实物资料。本文对此三篇碑记校释如下：

(一)《重修北镇禅林记》点校

〔碑文〕医巫闾山，胜甲幽州，留都之保障，神京之屏藩也。自虞帝肇封，历夏、商、周、汉、唐、宋、辽、金、元、明，世代禋祀，与岳渎并。兵燹后，梵宫贝阙，尽属灰烬。幸圣天子建极东巡狩，翠华蒞止，柴望山灵，抚松盘桓，瞻郁葱佳气，持挥宸翰，发帑建□，□□巍焕。允京兆请，睿藻缤纷，琐珉屹立，洵怀柔河岳，千古之荣恩欤？惟时镇神隆口祭佑。皇图天眷，协领常公，城守兹土；余亦幸邀简命，来宰是邦。协恭和衷，仰报洪恩，作万寿寺，立万寿碑亭，永祝圣寿无疆。犹虑住持乏高僧，无以妥神灵而酬君德，致貽庙□□□□将军、京兆，礼部延禅僧六雅为北镇庙主，朝夕焚香、晨钟暮鼓，庶以祝国佑民而无□□□。□圯，不蔽风雨，德馨陋室可奈何。常公曰，此良有司之责也。余曰然，鸠工庀材，补苴修葺，□□□□者，整建香积厨碾各数椽。东西禅林，聿新俨然。闾山之胜，刹藉非镇神灵佑、圣天子之福庇，不至于此。落成，常公嘱余记寿石。余鄙儒俗吏，何记之有？聊志夫略如此要，欲妥神灵之赫濯，酬君德之高深，与医巫闾山并峙不朽。至勲事、监工、劝输、乐助，姓名书左。管理广宁城守尉、加二级，常爱；文林郎、知广宁县事，暨阳钱世勲全撰。大清康熙五十四年、岁次乙未，三月十八日立。奉天广宁汉军副榜 胡天成书丹。

校注：

重修北镇禅林记：《辽宁碑志》误录为重修北镇庙禅林记^{[11]251}。

留都：《辽宁碑志》误录为晋都^{[11]251}。

贝阙：《辽宁碑志》误录为具阙^{[11]251}。

(二)《万寿寺禅林比丘坛传演毗尼碑记》点校

〔碑文〕如来所说，俯恢六度。世人善反，莫非觉岸津梁。况皈沙门。灭贼通昧即是波罗密多。自澄什踵起，林远分宗，师范道立，而衲子得入修行之门。如是所说，但象教常悬，信耳者众，僧性宝甚悯之。□立□邱坛，集诸僧受戒。惧以北镇尊神殿宇历代祠祀，洎我朝屡加增修，栋楹丹碧，不敢冒渎，爰扣请礼部长官允可，于五月望日起坛。延附法僧际海为师范，其阿闍黎及赞引礼各有司，俱藉神厨胥安，遂毕坛于八月朔焉。僧思人诚善反，登彼道岸，倚独比丘而溷迹空□，尚多不□□，以愿诸僧咸持十戒，不致下堕尘网也。且恐后有修法者莫知所从，因勒石

以记之。住持僧性宝和南谨记。大清乾隆十一年、岁在丙寅,八月穀旦立。

校注:

岸:《辽宁碑志》误录为岸^{[11]253}。

十戒:《辽宁碑志》误录为十式^{[11]253}。

□邱:疑为比邱。为避孔子讳,雍正二年“命加邑为邱……惟圉丘字不改”^{[16]2534-2535}。

毗尼:梵文 vinaya 的简译,也译为“毗奈耶”,意为律。与素担纆(经)、阿毗达摩(论)合称三藏。

俯恢六度:六度,也作六波罗蜜多(Pāramitā),意为“到彼岸”——离苦海成觉。也指大乘菩萨自度化他的六个途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俯,俯身;恢,弘。谓佛陀于高处向下弘扬佛法,度化世人。

灭贼通昧即是波罗蜜多:贼,六贼,六尘。昧,指三昧(Samādhi),意译为等持、正定。谓不受六根六尘所障,不令心散乱,达于心地澄明的禅那(定)境界。

澄什踵起:澄,佛图澄,晋怀帝永嘉四年(310年)到洛阳传法,精通义理,重视戒学,有神僧之誉^{[17]345-359}。什,鸠摩罗什,东晋太元八年(383年)入后凉,后秦弘始三年(401年)入长安,共翻译经律论传94部、425卷,被尊为中原佛教八宗之祖^{[17]45-59}。踵起谓相继而起。

林远分宗:林,东晋支遁,字道林,创般若学即色义,为般若学“六家七宗”中即色宗代表人物。倡顿悟,善谈玄^{[17]159}。远,东晋慧远,倡弥陀净土法门^{[17]211}。分宗,谓二者佛教宗派不同。

(三)《北镇万寿寺香灯碑记》点校

[碑文]梵堂有不灭之辉曰长明公,贝叶衍禅关之秘曰《传灯录》。盖法力无疆,原无取于燭火;而神光普照,亦不废乎松膏。玉盞明而人人思登觉路,金炉热而在在想度迷津。是以官绅商贾,悉发虔诚,刀布金钱,咸资盛举。玆见琉璃肆映,灯光与满月齐辉;宝鼎常燃,香烟绕青霄现篆。庶使晨钟暮鼓,借此以警人寰;宝忏金经,目之以唤客梦。初地成极乐之国,浮翠千重;殿宇为不夜之天,光明万寿。太子太保、总督川陕等处地方军务兼理粮饷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加三级,尹继善;刑部员外郎观音保。乾隆十六年、岁次辛未,仲秋月穀旦立。了然,主持僧海清、性愷。石工齐圣。(注:刑部员外郎观音保以下数人名略,碑阴名录略^{[11]254}。)

校注:

悉:原碑刻为悉的俗体,《辽宁碑志》误录为

志^{[11]254}。

常燃:《辽宁碑志》误录为常煇^{[11]254}。

现篆:《辽宁碑志》录为现篆^{[11]254}。道教中以云篆指祥瑞。碑文字体为符篆之篆,指行香所显瑞兆。

三、北镇庙万寿寺禅林考

(一)万寿寺的创建

万寿寺创建于康熙五十一年。为筹备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三月的康熙六旬万寿节,康熙五十一年,广宁政界代表、广宁县知事钱世勳与当地驻军代表、管理广宁城守尉常爱于北镇庙立万寿碑,并修建了万寿碑亭。钱世勳还撰写了《万寿碑亭记》^{[11]250-251}。创建此寺的初衷也是为康熙祝寿。“协恭和衷,仰报洪恩,作万寿寺,立万寿碑亭,永祝圣寿无疆。”^{[11]250-251}“天子万寿”典出《诗经·大雅·江汉》^[18]。

据明代张岫《北镇庙重修记》记载,“庙去广宁城西五里”^{[11]226}。据立于顺治十三年(1656年)的《北镇庙新建兴隆庵碑记》记载,此地曾建有兴隆庵。万寿寺应非改建兴隆庵而来。理由如下:《北镇庙新建兴隆庵碑记》碑立于顺治十三年,距康熙年间未远,但钱世勳两则碑志均未提及此庵^{[11]173-175}。《钦定盛京通志》卷九十八“祠祀二”目录下“广宁县北镇庙”条收录了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时所见的建筑。此时,北镇庙有御香殿、大殿、左右朝房、神厨等,未见其他寺庙记载^[19],说明此时官方记载中尚无兴隆庵。立于康熙五十一年(1716年)的《万寿碑亭记》碑明确“作万寿寺”,未作改兴隆庵为万寿寺,说明万寿寺非兴隆庵。且立于康熙五十四年的《重修北镇禅林记》对兴隆庵也未作说明,仅云东西禅林。万寿寺禅林建在北镇庙东门外,乾隆时期于其北部建造了广宁行宫^{[11]251-252}。

(二)寺院发展大事

1. 康熙五十四年,修缮禅林并设立负责人

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禅林倾圮,广宁知县钱世勳与广宁城守尉常爱协商对禅房进行了修缮,恢复了禅林的正常使用功能。北镇庙属于道教体系中的神庙,万寿寺首任负责人、同时也是北镇庙庙主六雅的任职由清廷礼部批准。北镇庙不以道士而以禅僧为庙主,反映出康熙年间道教人才的匮乏和佛教话语权的提升。

2. 乾隆十一年,举行传戒活动并立寺院规矩

据《万寿寺禅林比丘坛传演毗尼碑记》记载,乾隆十一年,万寿寺禅林举行了戒律仪轨修习活动,体

现出僧团组织对戒律的重视。

(1) 戒师及修戒经过

参加戒律修持的僧人较多,寺院“立比丘坛,集众僧受戒”。寺院聘请僧际海为戒师,修行时间自乾隆十一年旧历五月十五至旧历八月初一,历时两个半月。

《万寿寺禅林比丘坛传演毗尼碑记》记载“以愿诸僧咸持十戒”,说明戒本或依弗若多罗、鸠摩罗什合译的《萨婆多部十诵律》。此外,鸠摩罗什在译出《十诵律》大部前先翻译了《十诵比丘戒本》,对三皈五戒、具足戒等有详细说明。此次所修的戒律或包括了菩萨戒中的十重戒。菩萨戒在西域形成了原始密教戒律;在印度形成了瑜伽系、优婆塞系菩萨戒;在中国形成了梵网系菩萨戒。中国历史上流传最广的是梵网系菩萨戒^[20]。《梵网经》对禅宗清规的制定产生了较大影响。戒条或为《梵网经》记载的十重戒。文献记载表明,修戒期间未出现人员伤亡。

(2) 受戒仪式制度化

此碑不仅记载了万寿寺传戒的经过,同时,“恐后有修法者莫知所从,因勒石以记之”也说明碑文作者、寺院主持僧性宝将受戒活动制度化。

3. 乾隆十六年,举行捐资供奉香灯活动

佛教中将燃灯作为对佛的供养的必需形式。灯是佛教六种供养道具之一,象征智波罗蜜。在寺院、佛塔、佛像前燃灯祈福是佛教的重要宗教仪式活动,也是佛教徒积累功德的一个重要途径。《无量寿经》《佛般泥洹经》等佛教经典均有相关描述。如《无量寿经》(《大正藏》T4, No. 0202)记载佛将愿生彼佛国者按功德智慧程度分为上、中、下三类。其中,中等程度者不出家为僧,但修行中若积累了“悬缯然灯,散华烧香”等功德^{[21]394},则有利于往生阿弥陀净土。该佛教文献强调了香灯供养的重要性。佛教信徒出资设置石灯,镌刻石幢、矗立石柱等也成为一种佛教文化传统。香代表清净之义,也是佛教重要的供养道具之一。《无量寿经》《贤愚经》《增一阿含经》《首楞严三昧经》《法华经》和《维摩诘经》等佛教经典均有相关记载。如《贤愚经》(《大正藏》T12, No. 0360)第六卷富那奇缘品描写羨那欲学佛,富那奇乃令其以旃檀建造佛堂。事毕,二人持香炉登楼,向祇洹精舍方向祷告,表明将供养佛陀和圣僧的不渝之愿。此香未几抵达佛所在处,经云二人所求之事为佛所知。翌日,佛陀及诸罗汉以神足通至其邑,羨那复以香华及众妓乐供养^{[21]272}。在这里,香不仅具有供养佛及佛弟子的功德,也成为传递信徒心音、上达圣

听、沟通人神的灵验媒介。奉香供灯活动一般伴随梵乐演奏、歌舞供养,多在重要佛教节日或法会时举行。

据《北镇万寿寺香灯碑记》记载,乾隆十六年仲秋,参与佛教捐资供香供灯的有清代知名政治人物章佳·尹继善和刑部员外郎观音保。章佳·尹继善是清代雍正、乾隆时期知名的政治人物、学者、文学家,他长期任职江南地区,关心民瘼,政绩斐然。清代著名诗人、浙江钱塘人袁枚在《小仓山房外集》中记载,“民相与父驯子伏,每闻公来,老幼奔呼相贺”^[22]。章佳·尹继善曾修纂《江南通志》并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此外,广宁、开原等地的政、军、学界要员以及国子监太学生和当地儒学生徒也参与了活动,供香灯活动十分盛大。

清代,盛京地区最有影响力的藏传佛教庙宇是始建于清崇德元年(1636年)的实胜寺。明清时期,喇嘛教在蒙古成为国教,信仰群体覆盖了社会各阶层。后金天聪十年(1636年)皇太极为征漠南蒙古获取的蒙古最高护法佛像、国宝玛哈噶喇(Mahakala,意译大黑天)金佛像建立了佛堂。《清太宗实录》卷四十一记载,“上征察哈尔国时,察哈尔汗出奔图百忒部落,至打草滩而卒。其国人咸来归顺。有默尔根喇嘛,载古帕斯八所供嘛哈噶喇佛至。上命于盛京城西三里外建寺供之。”^{[23]565}实胜寺碑也有记载^{[11]70-71}。天聪十年四月,皇太极改元崇德。七月,下诏在佛堂基础上扩建为实胜寺^{[11]70-71, [23]565-567}。建佛堂与扩建佛寺的初衷是为了从宗教的角度笼络漠南蒙古贵族官员旧势力,使民心顺服,巩固清政府和漠南蒙古势力的关系,进而开展对漠北喀尔喀部的招抚。乾隆四次东巡均亲临此寺并留下御制诗文。盛京地区大乘禅宗的庙宇中影响力较大的伽蓝为万寿寺。

(三) 僧伽与僧谱考

石刻文献是了解东北禅宗僧谱的珍贵资料。《北镇县志·人物志》“仙释”条记载了与北镇庙有关的明代道士1人,清代僧人2人^{[5]85-86}。三人均非一般意义上的方外之士,而是善于占卜、有所谓“法术”的奇人异士,但均与北镇庙无关。

碑志记载了万寿寺康乾时期的三任负责人名及职务。乾隆十一年,万寿寺主持为性宝;乾隆十六年寺院主持僧为海清、性愷。性愷或为海清的师叔,与性宝或为同辈关系。明清时期,佛教僧人注重世谱(佛教家谱)的撰写,如《禅灯世谱》等谱书记载详细的法脉、法嗣传承与禅子名号,并严格按谱字为法子

命名。据石刻文献推断此支宗谱中有“性海”二字。因不清楚上承、下续的谱字,故难以断定万寿寺僧团为“五家七宗”中的哪一支系,但碑志是进一步了解清代东北禅宗法脉传承的珍贵资料。

北镇庙距闾山不远。闾山“游目天表”摩崖石刻附近的塔林有一处石碑,刻有“传曹洞正崇簿二十三世圆寂离染辉禅师觉灵”诸字^[24]。此碑中的曹洞宗是否与北镇庙万寿寺“性海”系僧人有法脉关联,尚难下论断。此外,有论者考证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千山金顶毗卢派僧徒中有若干名性字辈僧人^[8],但此时距乾隆十一年已逾半个世纪,且毗卢派不属于禅宗“五家七宗”之一,因此,万寿寺僧与金顶毗卢派应无法脉关联。

四、碑志的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

(一)碑志的历史价值

万寿寺碑志除了是宗教学方面的重要史料,有助于研究清代东北佛教尤其是禅宗发展史以外,还可补清史及民国地方志之不足。

1. 考证章佳·尹继善仕历和乾隆朝西藏事务的重要史料

《清史稿》“列传第九十四”记载,章佳·尹继善于乾隆十四年(1749年)被加以太子太保衔,乾隆十五年(1750年)兼管川陕总督,乾隆十六年调任两江总督。“十四年,命参赞军务,加太子太保。十五年,西藏不靖,四川总督策楞统兵入藏,命兼管川陕总督。十六年,复调两江。”^{[16]10547-10548}

《清史稿》记载的章佳氏乾隆十五年的职衔不全,石刻文献《北镇万寿寺香灯碑记》记载为“总督川陕等处地方军务兼理粮饷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章佳氏乾隆十五年的临危受命与乾隆朝西藏珠尔默特那木札勒叛清事件有直接关系。乾隆十二年(1747年),西藏多罗郡王颇罗鼐去世,其次子珠尔默特那木札勒袭爵。乾隆十四年,清廷为节约军费,下令将驻藏的大部分官兵撤出藏区,给珠氏叛清以可乘之机。乾隆十五年,清高宗命四川总督策楞率川军开驻西藏平乱,任命章佳·尹继善为总督川陕等处地方军务兼理粮饷兼都察院右都御史。

珠氏叛清是乾隆执政时期重大的政治事件和军事事件。作为清高宗的姻亲、政治上高度信任之臣,章佳·尹继善身负重要使命。其职衔中排在首位的是“总督川陕等处地方军务”。军事方面,一旦四川总督策楞平乱期间战败或叛清,或策楞平此乱后其他战事又起,策楞孤掌难鸣,章佳氏或派员调兵解决

问题或亲率川、陕等地部队开驻西藏;其职务还包括“兼理粮饷”,如部队缺少粮饷,或部队作战期间被断了粮道需要粮草补给等,其应进行征调、补给。政务方面,其职务“兼都察院右都御史”,说明被赋予弹劾办事不力、克扣军饷、冒领军功等怠政或违法官员的权利。章佳氏在乾隆十五年西藏平乱之役中肩负了重要的历史使命,其也没有辱没使命。

平乱后,乾隆十六年,清廷公布《酌定西藏善后章程十三条》,对西藏行政管理办法进行了一系列改革。章佳氏调任新职的具体月份,《清史稿》语焉不详。如石刻文献记载无误,其调任两江总督应系在乾隆十六年仲秋节后。其于乾隆十六年何时赴任他职也说明了平乱后、西藏政改后,藏区政局何时基本趋于稳定。

2. 补纂《北镇县志·官师志》的宝贵资料

与明代《辽东志》、清代《盛京通志》《锦州府志》《广宁县志》相比,民国《北镇县志》编纂体例上未设置《官师志》或《职官志》。据石刻文献记载,乾隆十一年,广宁县文官中知县为翟廷杰;武职有管理广宁等处守尉、管理熊岳等处城守尉为马奇,正白旗佐领为巴里赛;学官有广宁县儒学训导为牛尚信。乾隆十六年,广宁县知县仍为翟廷杰,加文林郎散官(与知县同级);武职有广宁防守尉为永暖;管理经济事务的官员有管理广宁旗仓事务监督为宝绥;学官有锦州府儒学教授,署广宁县训导蔡焯。乾隆十一年时的正白旗佐领巴里赛已升任开原城守尉(守尉下设佐领、防御、笔帖式等职)。此外,还有广宁佐领、广宁防御、工部笔帖式等文武官吏。

较之明志,清《锦州府志·官师志》记载职官已失之简略,锦志于广宁县职官中仅记载知县、典史、巡检三职^{[9]847},武职官员未能收录。然锦志于《武备志》明确记载清代广宁武阶有城守尉、笔帖式等^{[9]844}。《北镇县志》编纂更为仓促,体例未备。石刻文献对于补纂民国县志职官志有重要价值。

3. 了解广宁举人任职情况的珍贵资料

《北镇县志·政治志》“科举”条记载了清代的22名举人名单及中举时间,未记载举子释褐后的任职情况^{[5]117}。明代的《全辽志》《辽东志》记载了明代广宁举人的授官情况。清代《锦州府志》记载了康熙二十一年以前广宁籍士子中举后的授官情况^{[9]347}。相比较而言,民国县志有失简率。清代,举人可以大挑^[25]。举人张之蔚(康熙辛卯科)在《政治志》有收录,但碑志详细记载其于乾隆十一年时任江南庐州府庐江县知县。石刻文献丰富了人们对清代北镇举

人任职情况的认识,有助于地方志的补纂修订。

4. 有助于了解广宁县学毕业生任教职的情况

据石刻文献记载,原任正定府栾城县儒学训导、广宁籍贡生胡琦,现任顺天府平谷县儒学训导、广宁籍贡生张全均为广宁人。《北镇县志·人物志》未收录上述诸人^{[5]51-88}。《北镇县志·人物志》“耆旧”条清代记载较略,所收录者均曾为显宦、名宦。明清两代,县学成绩优异者可以岁贡身份被推荐至国子监深造。进修者毕业前,主管部门从中选拔可用为教官者授予州、府、县学教职。《全辽志·选举志》记载了明代广宁岁贡生入太学后被授予学官的人员名单及任职学校名称、职务。清代《锦州府志》仅记载了康熙二十一年前的广宁籍岁贡入太学深造的一名学生名单^{[9]35}。民国《北镇县志》体例有欠丰赡,资料有欠丰富。在当代编纂县志时,应参考石刻文献,充实地方志的内容。

5. 撰写清代东北教育史的宝贵资料

《北镇县志》中未记载学官名单。石刻文献记载广宁县儒学官员有:乾隆十一年,县儒学训导牛尚信;乾隆十六年,锦州府儒学教授、署广宁县训导蔡焯。《清史稿·职官志》记载县儒学设教谕、训导各一人^{[16]3359}。清朝官制,府儒学教授为正七品,县教谕正八品。蔡焯职衔为锦州府儒学教授,职级为正七品,且加文林郎散官(正七品)以强调职级,因此俸禄均按七品支給。或因当时锦州府儒学教授已满编(定员一人),其他正七品职位均未有空编,因此,暂定岗为县学训导。此外,文献还记载了三名广宁县儒学生员名:贡生张全(乾隆十一年任京师顺天府平谷县儒学训导),《北镇县志》“副贡”等条均未收录^{[5]117-119};任克明、刘朝良(乾隆十六年时为儒学生员)。

清代注重科举教育、儒家人才的培养,《锦州府志》记载了清代儒学官员名单及人员职务变动情况。以锦州府儒学教授为例,有张瑄(顺天府蓟州人,岁贡生,康熙四年任府学教授,康熙十年因病卒官);李元发(顺天大兴人,举人,康熙十一年任教授,康熙二十一年升任四川云阳县知县)等^{[9]342}。《北镇县志》体例未备,在当地补纂县志时应予借鉴。

6. 可补《北镇县志》地理志与艺文志之阙

《北镇县志·地理志》“古碑”条虽有北镇庙碑的记载,但于元、明时期的碑刻以外仅云尚有石碑数座,字迹漫漶难辨^{[5]48}。虽记载有十余通明代的寺庙碑,但未载录碑志。《北镇县志·艺文志》中收录了部分碑志文,但未收录上述三篇碑志^{[5]165-184}。石

刻文献可补史志之阙。

明清两代辽东地方志如《全辽志》《辽东志》《锦州府志》和《广宁县志》均纂有艺文志,但《全辽志·艺文志》只刊载歌咏庙宇之诗,不登载寺庙有关的碑志文;《辽东志》也未刊载佛教碑志文。《锦州府志》收录了6篇寺庙碑志文,相对于明志而言,是一个突破。且其中有1篇广宁寺庙碑志文^{[9]873-874}。明清碑志数量不少,但地方志刊刻不易,卷数不能过于浩帙,且在当时人的观念中,碑志文既已勒石,当传之不朽。因此,今天所见到的《辽宁碑志》收录的佛教寺庙碑志绝大多数非辽东地方志所载。三则碑志对当代补纂地方志之地理志、艺文志有重要价值。

(二) 碑志的艺术价值

清代,佛教碑志文学作品较为丰富,部分以碑的形式保存下来。以《辽宁碑志》为例,收录的佛教碑志内容或阐宗教教理教义,或言立碑的缘起、经过,或述伽蓝的结构布局以及兴衰演变,或记信士香客的祝祷灵异等。内容方面,《重修北镇禅林记》的关注点在现世的社稷安危、帝业永固,体现的是儒家提倡的忠道;《万寿寺禅林比邱坛传演毗尼碑记》的主旨在于以立碑的形式确立万寿寺后世的传戒轨则;《北镇万寿寺香灯碑记》的目的在于宣讲佛理,颂扬功德,以立碑的形式记载功德主的名号,传之不朽。

文学形式方面,《重修北镇禅林记》以散体行,文风古雅,体现了宋元以来以古文为碑志的传统;《万寿寺禅林比邱坛传演毗尼碑记》则是骈散结合,以散体为主,兼杂以骈句,如“世人善反,莫非觉岸津梁”“灭贼通昧,即是波罗蜜多”。《北镇万寿寺香灯碑记》以骈体为主。文中有多个俚句、偶句,对仗工整,如“琉璃肆映,灯光与满月齐辉;宝鼎常煇,香烟绕青霄现篆。”“晨钟暮鼓,借此以警人寰;宝忏金经,目之以唤客梦。初地成极乐之国,浮翠千重;殿宇为不夜之天,光明万寿”等。而“盖法力无疆,原无取于燭火;而神光普照,亦不废乎松膏。”去掉“盖”、“而”,为典型的四六句式。“玉盏”两句若以虚词处顿,也符合四六的变式特点。唐代骈赋中均有上述写法。文风典雅,体现了骈赋错彩镂金的美感。《昭明文选》中收录了一些骈体风格的碑志文学作品,如北齐王简栖的《头陀寺碑文》^[26]。本文在文体这一点上继承了以骈体为佛教碑志的传统。

以骈文为碑志与骈文复兴的时代风气、清代“选学”的兴盛等有一定的关联,与清代科举考试制度也有密切关系。清初,宜兴陈维崧、嘉兴毛奇龄等倡导骈文创作并身体力行。康熙十八年(1679年)博学

鸿词科规定以诗赋为考试内容,这一导向也使《文选》重新受到人们的重视^[27],促进了骈文的创作。康乾时期钱塘袁枚、绍兴胡天游等名家辈出,当时还出现了骈散结合的文学风气。《万寿寺禅林比丘坛传演毗尼碑记》骈散结合的写法、《北镇万寿寺香灯碑记》的骈体行文方式均反映了当时的文学风气和艺术趋向。虽然时代风气如此,但《辽宁碑志》收录的清代寺庙碑的碑文文体结构大体是散体形式,骈散结合、骈体的碑志较为少见。石刻文献对撰写清代东北文学史尤其是碑志文学史有积极意义。

此外,北镇庙现存此三则碑志对研究清代东北地区书法史具有重要价值。清代是中国书法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高峰,出现了书体审美形式的新变。楷体方面,受清初金石学的兴起以及康熙朝印制碑帖、颁赐御书等一系列意图加强意识形态管制举措的影响,清代前中叶书法创作出现了“正体化”倾向。重修北镇禅林记碑体现了“正体化”的艺术风格。碑志结体严整,字迹端庄,气势凝重,行笔(用刀)流畅。清初,西岳华山庙碑拓本得到了广泛传播,书法界也出现了师法汉隶的艺术风气,这在本碑中也有所体现。公、余、各、全等部分字的捺的写法似取法自华山碑,正而沉静,波磔翬翬。但间架结构不若汉隶扁方,也未取华岳碑行距过于整齐的形式,因而端而不滞。书家取益多师,融汇变化。如“闾山”的“山字”,右竖故作突兀,这种形式上的变化似借鉴自明代王履仁《夜燕石湖草堂》诗卷。作品正则典雅,若蔚木秀于崇阿,是较为出色的一方碑志作品。

清帝中,康熙推崇董其昌书法,乾隆酷爱赵孟頫翰墨^[28]。上好下效,乾隆年间,朝野上下学写赵体字成为一时风尚。以北镇万寿寺香灯碑记碑为例,部分字以行楷行。美学风格有“二王”的部分特点,但绝非全盘法自“二王”,更接近赵孟頫松江宝云寺碑、佑圣观重建玄武庙碑的写法。既有行书的风神,部分字又融合了碑体结构严谨、端肃内敛的特点。不同于清中叶“正体化”的写法,笔画及行间注重映带,不滞于一区一枢,如八部闻法,聆玉音而涤荡尘垢;若梵天献华,挥曼袂乃幻化大千,具有一定的艺术价值。

五、结 语

清代,乾隆、嘉庆、道光东巡均到北镇庙祭祀,在北镇庙留下了诸多御制诗文碑,形成了清代皇家御笔碑林。万寿寺碑作为清帝广宁行宫前矗立的、北镇庙自隋代创立以来唯一的寺庙碑类型的碑志和佛

教碑林,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万寿寺碑志不仅有助于研究清代东北佛教史,也有助于弥补清史及民国方志中职官志、人物志、地理志、艺文志等编纂的不足。三通碑志也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和艺术价值,是研究和撰写清代东北地区碑志文学史、清代东北书法史的重要文献资料。

借鉴北京故宫博物院的经验做法,深入挖掘北镇庙的旅游文化资源,结合东北文化特点、满族文化特点,打造清帝祭祀同款旅游线路、住宿线路(如建造类似广宁行宫样式的旅馆),印制清帝御制诗、御制文等北镇庙文学方面的个性化明信片纪念品,制作相关碑文的珍贵拓本,在展览馆报告厅或在景区设置讲座室,开设历史与碑志文学讲座或播放相关视频,研发个性化旅游产品等,对促进当地旅游经济发展,繁荣当代文化等均有积极意义。

参考文献:

- [1] 刘扬.近代辽宁地域社会视野下的寺庙文化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11.
- [2] 贾辉.辽宁北镇医巫闾山寺庙碑文、古钱窖、古暗道的新发现[J].东北史地,2008(2):95-96.
- [3] 王志钢.清代钱世勳北镇庙碑文考[J].中国书法,2018(16):173-176.
- [4] Veronika J, Raisa S, 孙春瑶.北镇庙石碑的保护性设计方案解析[J].沈阳建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9(5):460-465.
- [5] 王文璞,吕中清,孟宪彭,等.北镇县志[Z]//中国地方志集成编委会.中国地方志集成:辽宁府县志辑22.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 [6] 邱高兴,韩朝忠.东北佛教的初传与流布[J].社会科学战线,2014(10):112-118.
- [7] 雪莲.赤峰地区辽代、清代时期的佛教寺庙文化调查[J].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35(11):9-12.
- [8] 王佳.东北佛教金顶毗卢派的历史传承和发展现状[J].宗教学研究,2016(3):137-142.
- [9] 刘源溥,孙成.锦州府志[Z]//金毓黻.辽海丛书:第1册.影印本.沈阳:辽沈书社,1985.
- [10] 陈坚.从辽代佛经的三次发现看辽代北京印刷品[M].北京:首都博物馆论丛,2000:78.
- [11] 王晶辰.辽宁碑志[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2.
- [12] 李辅.全辽志[Z]//金毓黻.辽海丛书:第1册.影印本.沈阳:辽沈书社,1985.
- [13] 王志钢.《兴中府尹银青改建三学寺□供给道□千人邑碑铭并序》考释[J].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20(1):14-20.
- [14] 王志钢.北镇碧霞宫观音殿与关帝药王庙重修纪念碑

- 考[J].辽宁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20(2):89-91.
- [15] 卢秀丽.清帝东巡与广宁行宫[J].内蒙古社会科学(文史哲版),1994,15(2):71-73.
- [16] 赵尔巽,柯劭忞.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7.
- [17] 汤用彤.高僧传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2.
- [18] 阮元.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M].影印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574.
- [19] 阿桂,刘谨之,程维岳.钦定盛京通志[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16.
- [20] 湛如.敦煌菩萨戒仪与菩萨戒牒之研究[J].敦煌研究,1997(2):77-78.
- [21] 高楠顺次郎.大正新修大藏经[Z].东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929.
- [22] 王佩佩.尹继善及其诗歌研究[D].沈阳:辽宁大学,2016.
- [23] 清实录:第二册[M].影印版.北京:中华书局,1986.
- [24] 王志钢.《石棚西崖新修关帝庙记》校释[J].文化学刊,2016(10):213-215.
- [25] 张振国.清代举人大挑的次数与频率[J].史学月刊,2012(10):130-132.
- [26] 萧统.六臣注文选[M].李善,吕延济,刘良,等注.影印版.北京:中华书局,1987:1084-1093.
- [27] 付琼.清代科举与《文选》接受[J].求是学刊,2009,36(6):102-107.
- [28] 黄惇.赵孟頫书法研究二题[J].中国书画,2005(8):166-168.

(责任编辑:陈丽琼)